

第九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閩粵·海洋”研習心得

石鵬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日本築波大學聯合培養博士生

我的家鄉琅琊，是先秦時期著名的海上港口，甚至在《越絕書》等早期文獻中有越王勾踐徙都琅琊之說。由於我生長在海濱之地，自詡對海洋并不陌生。然而藉助“閩粵·海洋”研習營，從珠海、廣州再到汕頭、泉州，通過實際的田野考察，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對海洋是如此的陌生！這種陌生感源於我對海洋之於中國歷史的影響和意義，從未認真思考和追尋過。甚至一度驚訝于日本學者上田信竟從海洋的視角來審視整個明清時代，撰寫出有異于其他明清通史類著作《海與帝國：明清時代》一書。幸賴此行得以聆聽濱下武志老師的講座，使我對海洋史的研究方法與理論稍有瞭解。

在這次研習營，多位老師提出要打破固有的思維，清空自己原有的認知，號召從田野的現場感受歷史。這實際上在提醒我們，摘掉“有色”眼鏡，放下偏見，才有可能貼近當地的歷史。當我們參觀“南海一號”內部挖掘現場時，我才體會到什麼叫做“歷史感”和“歷史想象”。看到沉船靠近前艙部分有一根寬大的橫梁，我立刻腦補出該橫梁牢牢地固定住了高高的船桅，桅杆則撐起了風帆；看到沉船上出土的鐵釘，我似乎聽到船工在造船時，用鐵錘把鐵釘敲進船體所發出的叮叮噹噹的擊打聲；看到船艙裏殘留的瓷器，我又想象到為了節省船艙的空間，當時它是如何被擺放在一起的。思緒上接洽千年之風物，這種內心的觸動實在是難以言說。

此外，我注意到，按照現在海上木船的形制，水手和伙夫的生活起居一般是在前後船艙中，但是在南海沉船中很難看到這種痕跡。現場的講解員提到，貨物與船艙頂端還有一部分空間，此應該是船員的生活空間。田野調查當與文獻記載相結合，在宋人朱彧《萍洲可談》中，我看到“舶船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這樣的記載，不禁想到：在茫茫的大海上，貨船要航行數月，而在夜間或是雨天，船員只能生活在如此狹小的空間！這種生活何等不易！若非親眼看到“沉船一號”，對我而言，在讀到這樣的歷史記載，很難對古代貨船上的船員產生一種理解與同情。能夠感受歷史的情懷和溫度，激發對歷史的想象力，這也許就是田野調查的魅力所在。

儘管歷史研究強調時間和空間地理的概念，但長期埋頭于故紙堆，有時容易忽視不同歷史人物在空間地理上的關聯。比如，孫中山、唐紹儀、容闈，這些都是近代史上為人所熟悉的人物。然而，應該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們同出生于廣東的香山縣

这一事实。通過考察梅溪牌坊、蘇曼殊故居等地，讓我得知香山縣不僅有孫中山、唐紹儀這樣的政治人物，也有實業家唐廷樞、華僑富商陳芳，以及文學才子蘇曼殊。后来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更是看到了宋元时期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外来宗教在泉州地区与东方文化的交融与共生。在我眼中，宋元时期的泉州，堪称中国的“耶路撒冷”。我想，這樣的考察行程安排，其目的盖在於讓我們感受海洋對地域的多方面影響，而不是一提到海洋，則停留在港口及對外貿易等固有的印象之中。

在考察过程中，我也在思考：在通史教育中，傳統中國長期被視為一個“內陸”王朝，海洋則是文明的邊緣。問題是，何以為中國？當我們談到“中國”這個詞時，地域間的差異性是否被抹杀了？從內陸到沿海，不同的自然、地理特徵孕育的歷史文明也略有差異，何為中心，何為邊緣？如果是以國家權力和意識形態的控制大小作為區分標準，那麼，作為歷史研究對象的主體——人，應該放在何種位置？對於閩粵沿海居民而言，雖然“天高皇帝遠”，但在這一區域，他們就是主人，就是歷史的創造者，而非所謂的歷史邊緣。如清代廣州的海幢寺，可以說是來廣的外國商人認識當時中國的一個視窗。從宗教、經濟、對外交流等不同視角去審視這座寺廟，總能看到它不同的歷史面相。這還是歷史的邊緣嗎？

“中心”和“邊緣”本来就是相對的概念，利用這套概念去解釋歷史，需要警惕在何種語境之下進行的比較與對話。

在研習營的最後，鄭振滿老師提到，歷史研究要“接地氣”。在當今史學研究中，用各種眼花繚亂的“理論”去解構歷史已成為一種時髦，“接地氣”的研究顯得彌足珍貴。我想，歷史研究要“接地氣”，田野調查當為重要的一環，其意義不僅僅在於“動手動腳找材料”，多發現了一塊碑記，多看了一份民間文獻，更大意義或許在於通過遺迹的現場，以及與當地人的攀談，用心去觀察和體驗當地的風俗人情，感受過往的人與事，嘗試理解國家話語權下的地域差異。或許這種用腳丈量出來的歷史研究，更能“接地氣”。